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成立始末

陶爱民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中，中共中央代表向国民党提出统一整编南方各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开赴华中敌后抗战的要求。经过艰苦谈判，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赣、湘、闽、粤、浙、鄂、豫、皖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由叶挺任军长。随着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的成立，新四军迅速组建并开赴抗日前线，成为与八路军遥相呼应的抗日劲旅。

▶武汉新四军总部旧址

筹备处正式挂牌

1937年10月下旬，叶挺从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出发，启程前往延安。11月3日，到达延安，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毛泽东等就国际国内的形势、抗日战争的发展趋势、国共合作抗日中的方针政策、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如何集中改编、改编后的干部配备等，和叶挺进行了深入交谈。叶挺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关于南方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改编和主要干部配备的方案，并一定尽最大努力去做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工作，落实中央的意见。会谈后，毛泽东和叶挺到中央大礼堂参加欢迎大会，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宣布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在延安时，叶挺同项英见了面，一起研究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和新四军组建事宜。

叶挺于11月12日返回武汉，第二天便对报界发表谈话，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强调“只要团结一致，前途一定是胜利”。就在叶挺离开延安之前，毛泽东于11月6日就新四军的编制和干部配备等问题致电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宁代表，通报了和叶挺会谈的情况及结果，决定“新四军隶属八路军，编两师四旅八团，拟项（英）副军长，陈毅政治（部）主任，周子昆参谋长。军（部）暂住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等。毛泽东虽然提出新四军“军（部）暂住武汉”，但鉴于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活动的8个省的游击区，有7个与江西互相联系，为了便于集中改编和就近指挥抗日，毛泽东又于11月8日致信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八路军负责人，提出了新四军“军部第一步设南昌”的意见。

叶挺回到武汉后，便立即开始了筹建新四军军部的工作。为了便于和驻在汉口的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中央派董必武于1937年10月在汉成立，1938年1月1日正式对外办公）联系工作方便，通过考察，叶挺选中了离武汉“八办”只有一街之隔的大和街26号的一排三栋房子，作为新四军的办公用房，并挂起了“新四军筹备处”的牌子。

新四军筹备处原为日租界日侨的住房，全面抗战爆发后，日侨全部撤走，房子就空了下来。叶挺选好办公用房，把“新四军筹备处”的牌子挂出来后，立即把中共中央提出的有关新四军的编制、干部配备、隶属关系、经费给养和改编后开赴前线、原地保留战略支点的方案，转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准。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提出的编制方案

11月21日，蒋介石电召叶挺赴南京。叶挺到南京后，和叶剑英一起面见蒋介石，向蒋介绍了中共提出的新四军的改编方案、意见和要求，却遭到蒋介石的极力否定。叶挺遂毅然提出辞职。蒋介石慌忙“挽留”，又让叶挺找陈诚“商量”。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提出的新四军的编制等方案，叶挺一面通过武汉“八办”董必武、叶剑英等将掌握的情况及时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一面积极奔走于国民政府各部门、各战区之间，要求他们给予支持。

到了12月，蒋介石急于在江南开辟敌后战场，又联络叶挺，催促他加快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11日，叶挺致电毛泽东反映这一情况。毛泽东接到叶挺的电报后，交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14日，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工作和新四军的改编问题，明确规定了新四军的发展方向、方针政策和组织领导，并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由项英、陈毅任正、副主任；同时决定新四军的工作由中共中央长江局就近指导。当日，毛泽东、项英就新四军的编制等问题，联名致电叶挺，对新四军的改编、坚持党对新四军的领导、新四军集中改编后立即开赴抗日前线以及维护两党的团结等问题作了答复。

按照毛泽东的电示，叶挺一面在武汉四处奔走，大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新四军广揽人才、筹集经费和军需物品，一面呈请中共中央派干部到新四军工作，以充实新四军的干部队伍。12月23日，项英率赖传珠等一批派往新四军工作的干部抵汉口，受到叶挺的热情接待。当晚，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八办”召开会议，会后，项英从“八办”来到“新四军筹备处”，与叶挺会面，商谈新四军的筹建问题。通过交谈，统一了同国民党谈判新四军组建方案的认识：先组建新四军军部，随后集中改编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军部在汉口成立后，迅速迁往南昌；按照国民革命军的统一规定设置新四军军部，但要扩大政治工作机构；军部各机构及下属组织主要领导干部的配备等（军部设司令部和政治部，司令部设参谋处、秘书处、副官处、军需处、军医处、军法处和兵站处；政治部设组织部、宣传教育部、民众运动部、敌军工作部、战地服务团）。

新四军军部成立

24日，叶挺、项英听取了赖传珠关于军部现有干部的情况和工作布置方案的汇报。25日，在叶挺、项英、张云逸的主持下，新四军军部在“新四军筹备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拟任参谋处长赖传珠、军需处长叶辅平、军医处长沈其震、组织部长李子芳、民众运动部副部长余再励、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等数十人。会上，叶挺、项英分别报告了组建中的新四军所面临的形势任务、抗战的形势和上海及南京失陷的经过和原因，并部署了当前的工作。会后，“新四军筹备处”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在此挂出了“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牌子。

新四军军部成立后，叶挺、项英、张云逸等一方面电召鄂豫皖、鄂湘赣和鄂豫边等部红军和游击队负责人到武汉商谈改编事宜，一方面抓紧落实新四军的改编和组建工作。经多方商量，敲定了新四军的组建方案，并将此方案向中共中央长江局进行了汇报。经过长江局和叶挺、项英、张云逸的反复研究，在坚持共产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国民党不派人到新四军的原则下，对新四军的编制做出了让步，即放弃了原来“两师四旅八团”或“两个纵队七个支队”的编制和新四军隶属于八路军的要求，同意江南部队暂归第三战区、江北部队暂归第五战区指挥等，形成了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组建方案。12月27日，项英等致电毛泽东等，就新四军组建方案进行了汇报。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并确定了一批干部配备方案。项英按此方案同国民党进行了谈判，并达成了一致。

12月29日，项英再次致电中共中央，就同鄂豫皖等部红军和游击队负责人商谈红军和游击队改编的意见进行了汇报，并对江南其他红军和游击队的集中改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1938年1月2日，项英在送走鄂豫皖等部红军和游击队负责人后，于4日率领近60名新四军军部的工作人员从武汉乘坐轮船前往江西九江，再由九江转乘汽车于6日晚到达南昌的新四军首长和参谋处驻地。

1938年1月初，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核准了中共提出的新四军支队以上干部的名单及编制、薪饷等。8日，何应钦核定了新四军组建方案。中共中央长江局将何应钦核定的新四军组建方案和编制情况向毛泽东和中央进行了汇报，并在电报中说：“要叶挺继续向陈诚请求增加经费至少十万以上及发表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等委令。陈诚已调回武汉，东线由顾祝同负责，将来新四军行动另与顾商量。”

1938年1月4日，项英等率新四军军部离开武汉后，叶挺继续留在武汉办理同国民党当局交涉增加新四军经费和干部任命等事宜，直到1月下旬才离开武汉前往南昌。1月28日，《新华日报》在头版刊登了陆军新编第四军司令部启事：“本军奉命即行整编出发，军部当即移驻南昌。前汉口大和街廿六（26）号军部即行结束，以后驻汉办事处事宜，委托八路军驻汉办事处钱（之光）处长代办。所有一切公文、信电，请迳投南昌三眼井本军部为荷。”

新四军军部迁往南昌后，在此成立了新四军驻汉办事处（和“八办”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两处办公），由“八办”钱之光处长兼任主任，负责“国共两党的联系”“接待过往干部和将领”“请领和转运抗战前线军需物资”等工作，直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前撤离。

（作者单位：武汉市民政局）

新四军一支队夜袭新丰车站之战

贾晓明

编后拾遗 BIANHOUSHIYI

1938年初，新四军完成组建，共辖4个支队10个团和1个特务营，全军1万多人。同年开赴敌后战场，进行广泛的游击战，扰乱日军后方，牵制和分散其兵力，配合主力部队正面作战。

5月中旬，新四军第一支队在司令员陈毅的率领下，挺进苏南地区，在江南抗日自卫总团和群众的积极配合下，向京沪铁路（南京至上海）及各公路沿线守备薄弱的日军据点展开袭击和破击作战。

6月，第一支队获悉镇江至丹阳间的新丰车站有日军1个小队守备。该火车站虽然是个小站，但因处于大运河与京沪铁路的交叉点，既可运军火又可运兵，因此日军十分重视，在车站旁边的营房顶上修筑了瞭望塔，三面均有射击孔。新丰车站南距丹阳县城仅约8公里，北距镇江也只有20余公里，一旦受到进攻，丹阳和镇江的敌人都可能随时增援。

第一支队二团多次派出侦察员潜伏在车站，查明守备日军的常规部署，画了草图，由二团政治处主任萧国生和一营营长段焕竞向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作了汇报。

经过认真考虑，陈毅决定由二团一营负责对新丰车站发起夜袭，歼灭该站守敌；同时决定由二团侦察参谋张铨秀负责指挥部分战士，在自卫总团和群众的配合下伴攻丹阳，乘势对新丰车站附近铁路及沿线通讯设施展开破袭，并阻击敌人援兵。

按照既定部署，6月30日下午，萧国生和段焕竞率领第一营从丹阳县延陵镇进至新丰以南的东岗附近隐蔽待机。

7月1日23时许，一营一部乘夜暗迫近新丰车站，20余名战士悄悄摸进守敌营房。在前进中，有战士触碰到日军秘密设置的警铃，惊醒的日军立即组织抵抗。激战中，日军10余人窜出房屋，企图突围。新四军突击队员当即挥舞大刀与日军展开白刃战，仅用10分钟便将这伙敌人尽数歼灭，部分战士乘胜冲进营房。残余的日军立刻退居楼上，利用坚固工事做掩护，向围攻的新四军突击队疯狂射击，妄图死守待援。由于残敌对楼口实施火力封锁，突击队员一时无法冲上去，战斗呈现相持状态。

不久，前方突击队员报告说，发现敌人的火力之强超出了原先的估计——原来当晚有一伙日军从南京去上海，临时停留在新丰车站候车，使敌人的防守力量几乎增加了一倍。由于没有攻坚武器，日军火力又猛，硬冲一定会造成很大伤亡。为了速战速决，一营长段焕竞一面命令集中火力压制日军的机枪扫射，一面立即指挥改用火攻。

战士们迅速找来煤油、稻草，在车站大楼的门窗旁、楼梯口，倒上煤油，点火后迅速撤离。火借风势很快烧上了墙头、窗户、屋顶，没几分钟整个兵营成了一片火海。顿时，烈火浓烟吞噬了整个车站大楼，楼上的敌人乱作一团，不久便纷纷毙命，有几个企图跳窗逃命，也被埋伏在外的新四军战士尽数击毙。

与此同时，二团侦察参谋张铨秀指挥一营部分战士一面佯攻丹阳县城的4个门，一面在抗日自卫总团和当地群众1000余人的配合下展开破路基、拆铁轨、拔电杆、割电线等破袭战，彻底切断了日军的交通和电话联系。丹阳等地的日军因情况不明，虽见新丰车站方向火光冲天，也不敢贸然在夜间出兵增援，只是龟缩在城中，向外胡乱射击。

此次夜袭战，新四军一支队二团一营歼灭守敌58人，烧毁新丰火车站，烧毁大部枪械，缴获步枪十余支和一批军需物资，扒毁丹阳至新丰、新丰至镇江铁路各1公里多，挖断了镇澄公路，砍断电线杆几十根，收割电线几百斤，京沪铁路和公路交通也因此中断。7月2日拂晓，日军援兵1000余人从各地赶到新丰车站时，新四军早已胜利转移。

这次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有力地打击了侵华日军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苏南人民的抗日信心和决心。

苏区干部随身携带的“三件宝”

吴昌荣

史海观澜 SHIHAIGUANLAN

1930年，中共莲花县苏维埃政府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保障苏区军需民用物资的供给，决定设立国民经济部，并任命朱义祖担任县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

朱义祖上任后，一面打击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行为，一面积极采取措施，在各区乡建立起消费合作社。不久，在朱义祖的主持下，在六市乡大沙与萍乡接壤处的三鼓坳建立了赤白交易所，将苏区剩余的粮食、茶油、棉花设法运到白区销售，换回苏区急需的食盐、糖、煤油、纱布等生活必需品，然后将这些必需品以平价销售给群众、红军及苏区各机关工作人员。

三鼓坳是莲萍分界山，因三个平顶的山头并列如三架皮鼓而得名，分界线上有座亭子，苏区和白区的群众就以这座亭子作为交易的场所。对从白区赶来贸易的商民，朱义祖一律热情招待，并适当予以奖励。亭子四周都是荒山野岭，林木茂盛，便于隐蔽。如果国民党军前来搜山，站岗放哨的赤卫队员一声暗号，交易的群众就会带着商品消失得无影无踪。敌人曾多次搜山“清剿”，但每次都一无所获，有时还遭受赤卫队的打击而损兵折将，只能“徒唤奈何”。

赤白交易所的设立为苏区解决了部分生活必需品的输入，但一些商品如食盐、药品等，仍需苏区干部直接深入白区采购。为此，朱义祖经常扮成“大老板”，跟随他的同志扮成“伙计”，冒着生命危险深入白区，从设在白区的地下采运点调进成批的食盐和药品等。回苏区前，朱义祖等人或将食盐、药品倒入棉衣的夹层里缝好，或藏在毛竹竿的内筒中，巧妙地避开敌人的层层搜查，将它们安全运回苏区。

苏区干部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优良作风，处处以身作则，与群众同甘共苦。朱义祖等人随身都带着三件东西——草鞋、灯笼、饭箩子（棕丝编织的袋子，里面装有干粮）。虽然长期在野外工作，钻林海攀高山过封锁线，但为了不搞特殊，朱义祖等只穿和穷苦百姓一样的草鞋（只是在化装进城时，才将草鞋换成布鞋）；由于白天忙于处理各项工作，前往群众家中访贫问苦一般都在夜间进行，为了方便赶夜路，朱义祖等都备有灯笼用于照明；为了不增加群众的负担，朱义祖等人下乡时都自带干粮，开饭时就拿出饭箩子，借群众家的火热一热里面的食物，边吃边和群众谈心，见到群众生活困难，朱义祖等还会毫不犹豫地将饭箩子里的食物拿出来和群众分享。

朱义祖等苏区干部扎根基层，心系群众，艰苦奋斗，忘我工作，受到苏区群众的衷心拥护和高度赞扬，而草鞋、灯笼、饭箩子也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苏区干部的三件宝”。

解放军乘火车解放义乌

佟雪辉

史海观澜 SHIHAIGUANLAN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挥师南下。二野十二军三十五师一路不顾疲劳，穷追猛打，连克敌人重镇，于5月6日深夜解放了浙赣线上的金华，消灭守敌1800多人。

5月7日下午，三十五师师长李德生接到十二军军长王近山的急电：“沪杭线残敌正沿浙赣线南逃，你部尽速占领义乌、东阳地区，堵截南逃之敌。”

金华是浙赣线上的一个大站，城外车站上停着很多列车与机车。为了争取时间，出敌不意，李德生等决定采取一个大胆行动：由金华乘火车向义乌进发，再从义乌转战东阳。随后，副师长贺光华连夜赶赴金华车站，专门办理车运事宜。

8日拂晓时分，李德生带着指挥部来到金华车站，和贺光华等召集各团干部，布置上车。

司机旁站着一〇三团侦察排长，专门负责瞭望前方。排长身边安装了电话机，以备随时与后面的营团指挥员联系。部队都坐在平板车上，机枪、迫击炮架在车头和两边，以备沿途若遇敌人阻击时能够迅速投入战斗。

为了麻痹义乌县城的国民党军队，列车启动前，贺光华命令金华火车站用电话通知义乌火车站称：“今天有国军乘列车到你站，请提前做好接车准备。”

8日下午3时，解放军乘坐的火车到达义乌。火车一进义乌站，便见月台上黑压压地挤满了人，前面一排还举着“欢迎国军”的大幅标语。原来，义乌的国民党县长接到金华火车站的电话后，随即率该县党政要人和义乌军警200余人列队来车站迎接。三十五师指战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立即冲下火车，将所有前来迎接的国民党义乌县党、政、警人员尽数俘获。随后，三十五师一〇四团进驻义乌县城。义乌县城随即和平解放，城内秩序安定，所有商店照常营业，学校照常上课。

与此同时，三十五师师部率一〇三、一〇五两个团沿义东公路开赴东阳。在城外消灭了敌人三一八师前卫营，随后紧紧追赶一天一夜，于10日在四路口镇包围并消灭了敌三一八师主力。

10日上午，中共地下党组织及游击队指战员200余人到达义乌县城，和解放军胜利会师。

早在义乌解放的6天前，在师长廖运升的带领下，国民党军一一〇师已在义乌县城西北的黄宅一带宣布起义。11日，廖运升得知解放军已解放义乌城，马上派人向三十五师领导汇报。李德生得知国民党军一一〇师起义的情况后，要求一一〇师起义部队按规定路线开到义乌城郊。12日，起义部队到达义乌城外，李德生等三位师首长出城门迎接，对廖运升率部起义表示欢迎，并设宴招待团级以上军官。

符昭骞率部突围

王琰

史海观澜 SHIHAIGUANLAN

1941年5月7日，侵华日军利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之机，集中兵力大举进犯中条山。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因拒绝反共摩擦，被软禁在峨眉山未归，以致“战区主帅缺位”，中条山中国守军只得仓促应变，分别与各路来犯之敌交战。

当时，中条山防线分东、西两段，两段防线在垣曲县城东北的桑池村衔接，防守这里的是战斗力较弱的晋军一部。鉴于该阵地的重要性，战前，第十四集团军参谋长符昭骞曾多次向上级建议“要特别警惕和加强垣曲门户桑池阵地的防御力量”，并提议增派后方预备队，但上级却以“该处工事最好，不要顾虑”为由，拒绝了符昭骞的建议。

8日凌晨，日军发动夜袭，突破桑池阵地，并于当日午后占领垣曲县城，将中国守军“分为两半”。符昭骞闻桑池失守，激愤得口吐鲜血，立即调集各部反击，一度夺回部分阵地，终因兵力不足，不得不放弃阵地。

为了与第九十八军会合，符昭骞说服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率军向北穿越王屋山，并利用天降大雨的良机，击溃日军一个大队，毙伤敌人数百人。但战至19日，第十四集团军主力仍未能与九十八军会合，而敌人各路军队已经蜂拥而至。符昭骞见状，立即建议刘茂恩将部队兵分两路突围。刘茂恩率一部东渡沁河；符昭骞率一部掩护伤病员和随军眷属向北突围。

符昭骞率部出发后，先在阳城西南地区与日军周旋了两周，突破了敌人的“梳篦式扫荡”，还收容了被打散的官兵近2000人。为躲避敌机的低空侦察和空袭，符昭骞命官兵和随行人员采取白天隐蔽，夜间行军、分组前进等方式与日军“捉迷藏”。5月正值中条山区青黄不接之时，部队粮食不够，符昭骞便命人宰杀战马，采集野果野菜充饥。当时，敌人为困死中国守军，将沿途村庄焚毁殆尽，并将老百姓全部赶走。每当路过被敌人烧毁的村庄，符昭骞就带人进入没有被烧尽的农舍细细查找，捡回灰烬中半焦可食的粮食颗粒。

就这样，符昭骞带领部队和敌人斗智斗勇，艰苦转战一个多月，终于在6月8日突破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到达黄河北岸，由柿林村、西河清、小浪底及塔地等口岸渡过黄河，进入洛阳一带休整。

由于符昭骞带领的这支部队的电台已经损坏，20多天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断绝，以致位于洛阳的战区长官部上下都以为这支队伍全部遇难了，还有人怀疑符昭骞“可能已经率部投降了”。符昭骞率部到达洛阳后，立即得到了上级的嘉奖。

在随后的日子里，符昭骞不仅没有因为成功突围而欣喜，而是因为未能守住桑池、垣曲关键阵地而导致晋南会战惨败而陷入深深的自责，后来还画了一幅《闻阵地失守吐血图》以示不忘。